



主动·回应·定向:中国共产党建构 “两个结合”的三维逻辑

李宣志¹, 邹庆国²

(1.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8; 2. 聊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坚持理论创新是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作为理论创新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在建构“两个结合”过程中遵循“主动选择—回应冲击—指向确认”三重逻辑。其中,主动选择的逻辑体现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主动性,回应冲击的逻辑关涉“两个结合”提出的客观需要,指向确认的逻辑反映“两个结合”的理论定位和应用指向。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探索过程中主动选择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跃升,面对教条主义倾向和全盘西化的冲击展开有力回应,并从不同角度对“两个结合”的定位和指向加以确认,最终在选择、回应、定向的三重进路中,“两个结合”得到了完整建构。

关键词:“两个结合”;建构逻辑;理论探索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390(2024)04-0005-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论断,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两个结合”在其生成和确立过程中遵循着“主动选择—回应冲击—指向确认”三重逻辑。具体来说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主动选择开展“两个结合”的具体理论探索,另一方面则积极回应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全盘西化等错误倾向带来的挑战与冲击,同时从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来对“两个结合”加以定位,最终在选择、回应、定向的三重作用下,“两个结合”的建构得到了逻辑证成。从中国共产党主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角度来探讨“两个结合”的建构,对于明晰“两个结合”的定位与指向、廓清“两个结合”的出场语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主动选择 “两个结合”建构于中国共产党理论探索过程中

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

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664}。中国共产党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就是坚持理论创新,这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全过程。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基于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论探索,走出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理论进路。

(一) 理论创新 “一个结合”的提出

20世纪初的中国,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交织,满目疮痍,亟待救亡。对于近代开明之士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在民族危亡时刻用以救国的学问,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天然带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内在基因。此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结合”的观点,但仍然能够看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是不希望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死板的教条来看待的。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曾提出:“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2]早期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代表性成果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收稿日期: 2024-03-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理论与机制创新研究”(23ADJ013)

作者简介: 李宣志,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党建;邹庆国,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党的建设。

该文是毛泽东深入调查长沙、湘潭、衡山、湘乡、醴陵等地的农民阶层生活现状和农民运动情况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分析的成果。此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转入土地革命时期,在广阔的农村地区开展革命,成功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形成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经过土地革命的具体实践,特别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结合实践经验从理论层面提出“一个结合”的客观条件渐趋成熟。

党中央抵达延安后,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土地革命时期革命道路探索的相关经验加以总结提炼,于1938年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鲜明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解放、走向富强、走向复兴的过程中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态度和原则。在此之上,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4]611}的论断,正式提出了“一个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探索的重大成果,是科学的、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创新。其后,在延安整风期间,“一个结合”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和最重要的学习内容,围绕这一论断,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一个结合”进行了论述,这不仅使“一个结合”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对于革命时期党的自身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最终,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一个结合”被写入党章,并在大会上由刘少奇进行了系统阐释,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5]335}。这样,“一个结合”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方法论被党的最高代表大会所确立,并在此后的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始终不渝地被坚持,直至今日仍然焕发着光彩与活力。

(二) 新的跃升: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

“一个结合”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时期,而“两个结合”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确立的,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最显著的差别就是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命题。“第二个结合”不仅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而且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一国的本土文化,而是明确指出“把

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1]574}。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应当建立在本国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之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承认其本身需要植根于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中。针对传统文化的问题,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6]。可以看到,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一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相贯通,也只有如此,才能够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这就是“两个结合”提出的理论依据。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的论断,但是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毛泽东是诗词大家,他的诗词中常常流露出对人民群众主体性的确认和对革命道路的阐释,也蕴含着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唯物史观的意涵,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探索。同时,毛泽东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的建设中的运用,在论及党员干部坚定政治方向时,他曾使用传统文化中的“气节”和“道德”加以论述,提出“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7]。刘少奇也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引用孟子的名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以说明共产党员锻造崇高政治品格、锤炼高尚政治修养的重要性,“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5]101}。改革开放后,面对市场经济的潮流和对外开放带来的风险,邓小平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8]358}。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论述和实践,为“两个结合”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和新的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多次论述了“第二个结合”的契合点和切入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层面上,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9]“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0]。通过总结前期探索的历史经验,加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作用和中华民族文明的深刻理解,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了“两个结

合”的重要命题。在主动的理论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愈加深刻,形成了新的理论跃升,走向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崭新道路。

二、回应冲击“两个结合”建构于反对错误倾向过程中

理论的进步往往存在于对错误思想的驳斥中。“两个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真理的丰硕成果,既是指导建设的思想法宝,又是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的思想武器。在建构“两个结合”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先后遇到了“左”倾主义、右倾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的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建构起了“两个结合”的生成逻辑。

(一) 思想路线的斗争: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错误倾向

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反映着党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对自身建设的认识,是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一个符合社会情况和自身现状的稳定的思想路线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与否的内在因素。建党早期特别是从大革命到遵义会议时期,党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典型的就是出现了三次“左”倾主义错误倾向,这三次错误倾向均为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结果。

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的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宣称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错误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执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战略,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31年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全会通过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和“左”倾主义路线,最终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针对以上三次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及时拨乱反正,从思想上克服了“左”倾主义的影响,也更加深入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对于瞿秋白“左”倾主义错误,次年召开的中共六大进行了反思纠正,指出这次“左”倾主义错误是基于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

势力的复仇情绪缺乏理性分析,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教条化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对于李立三“左”倾主义错误,当年9月即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改选了政治局,纠正了“立三路线”。针对教条主义倾向影响工农红军建设的情况,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1]。王明“左”倾主义错误是三次错误倾向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其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革命形势的变化,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党的建设和革命形势产生了较为严重的不良影响,这种错误倾向在遵义会议上得到初步纠正,直到在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中才彻底肃清。从本质上来说,“左”倾主义路线的根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这种教条化的思想路线披着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实则只是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和苏联经验的照搬,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更不会主动分析中国的社会现状和革命形势。在与这种教条主义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认识也逐步加深,最终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2]952}的论断。这一论断不仅纠正了错误的思想路线,而且为党的七大将“一个结合”写入党章做了理论准备和思想铺垫。

(二) 错误思潮的回应:反对否定传统文化的全面西方化错误倾向

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史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全面西方化的错误倾向从未在党内成为主流思想,但其却在特定时间或特定事件上成为影响力较大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在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时,也会对党内部分同志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全面西方化的社会思潮,绝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将影响自身文化自信和社会整合,酿成严重后果。自新文化运动起,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西化思潮就埋下了种子。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决同全面西化的错误倾向做斗争,对于这种错误倾向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的不同形式加以坚决反对,为“两个结合”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代以来,新文化运动虽然弘扬了民主与科学两大“先生”,但其中少部分极端主义者所倡导的

“打倒孔家店”等思想却认为应当全面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其中的代表人物为陈序经,他先后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东西文化观》等作品论述“全盘西化论”,认为“可以说彻底和全盘的西化,也是理论上所已达到而趋势所必然的”^[13]。这种思想观点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甚至影响了部分党员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为此,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指出,“有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14]797}。对于“全盘西化”的观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立场鲜明地加以驳斥,“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者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4]707}。改革开放时期,对外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建构不可避免地让西方各类思潮涌入中国,这一时期社会上出现了新的全面西方化论调,表现为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所谓“普世价值”“多党执政”“西式民主”等不符合中国国情、背离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对此,邓小平特别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任务”^[14]“不可能靠搞一场运动一蹴而就,而必须依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加上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10]208}。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迈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车道,“全盘西化”思潮的表现形式有了新的变化,并与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结合起来,更加激烈地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面对西方国家部分政客提出的“现代化等于完全西方化”“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错误观点,习近平总书记警醒全党“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15]。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6]315}。正是在对全盘西化错误倾向的坚决反对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继承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命题,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的命题得以提出和确立。

三、指向确认:“两个结合”的理论定位和应用指向

“两个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动探索与回应

冲击的过程中,伴随着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实践特征一路走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晶”^[17],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方法论。对于身兼理论拓展和方法论意义的“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对其加以定向,使“两个结合”得以建构起清晰的生成逻辑。

(一)理论定位之一:“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

从理论发展的层面来看,“两个结合”这一命题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第一个结合”自五四运动时起就在酝酿之中,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如何运用到中国都有相关解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具体革命实践,逐步明确了“第一个结合”的思想原则,并将其运用到革命斗争和反对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的实践当中,最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其后,随着中国国情的不断演变,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持续推进,在“第一个结合”的指导之下,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时代,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国情世情党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即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由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从上述历程中不难看出,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不断深入、不断拓展,“两个结合”也随之发生相应的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变化。因此,作为理论成果的“两个结合”自身也是不断发展演进的,不能把“两个结合”仅仅作理论工具,而应该看到其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从这个层面上讲,“两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是适配当今中国国情和本土文化、助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

(二)理论定位之二:“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

历史经验和实践历程一再证明,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抑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都离不开“两个结合”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

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8]在“两个结合”视域下,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棘手难题得以迎刃而解: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科技革命和网络技术飞速发展,面对形势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如何适应新的实际条件并指导新的实践。“两个结合”作为科学的方法论,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跟随时代和实践的变化而创新发展,从而形成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持续发展更新,形成一个符合科学规律的逻辑闭环。事实上,这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即由实践到认识、再到新的实践和新的认识的螺旋上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个结合”充当了链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和纽带,有力推动了理论的更新和实践的发展。

(三)应用指向之一:“两个结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活力指明方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血脉中镌刻的文化基因,是中华五千年历史肥沃土壤中开出的靓丽花朵,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支撑。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与底蕴,就难以形成昂扬向上的文化自信,难以展现奋进有为的精神风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今中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新的历史条件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如何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两个结合”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多个维度的解决方案。在对传统文化扬弃的问题上,“两个结合”给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扬弃标准的答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筛选、甄别、继承、发扬的过程中有了价值判断的具体标准。在确立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上,“两个结合”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合点和切入点,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发展方向,“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17]315}。在推进优秀文化弘扬路径的问题上,“两个结合”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实际相结合,改变以往“技不外传”、家庭作坊式的传承方式,拥抱科技发展革新、网络媒体普

及的时代机遇,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持续发扬光大。

(四)应用指向之二:“两个结合”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文化基因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指征。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过程,可以看到其本身就包含“两个结合”的思想维度,而“两个结合”也从文化角度奠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基因。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建设必然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这就反映了“一个结合”的鲜明特征。从这个层面上讲,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折射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基因。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华文化氤氲至今的独有文明中孕育而来,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供给人类文明新形态胚胎的母体,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形成的文脉精神,通过“第二个结合”在新时代绽放光彩,也通过“第二个结合”使得人类文明新形态脱胎而出。在这个前提下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理所应当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需要指出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具有世界性的,这种世界性体现在对西方文明形态的超越上,其之所以能够开辟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形态,根本上就在于内在的两种文化基因——社会主义文化基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独特的文化基因使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独特的文明表征与文化指向,也使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征。而这种独有的文化基因正是由“两个结合”所奠定的,“第一个结合”赋予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基因,“第二个结合”则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内嵌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中。

四、结语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生动注解。回顾“两个结合”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着理论创新主体的作用,是“两个结合”的建构者和创立者。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首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的重要性,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新成

果;其次,中国共产党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来自外部各类思潮的冲击,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思想倾向,“两个结合”是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的;最后,“两个结合”作为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其自身定位和应用指向也需要明确,这样才能够使其不偏向、不走歪。在以上选择、回应、定向三重逻辑之下,“两个结合”得以建构。

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建构“两个结合”是一个综合的过程,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角度去理解。需要指出的是,就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来说,在明晰了“两个结合”的建构逻辑之后,紧接着就应当探讨其实际应用的问题。换言之,“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需要也应当放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加以应用。同时,对于“两个结合”在应用实践中所蕴含和表达的理论发展趋向也应当加以足够的理论观照与阐释。

这就是说,对“两个结合”命题的探究蕴含着“建构—应用—发展”三个方面。“两个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建构出的理论成果,需要用以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并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中持续深化对“两个结合”的认识,从而标识出其未来的理论发展趋向。“两个结合”的生成建构、实践应用与发展趋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三个问题,本文仅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后两个问题有待日后继续探究。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9.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51.
-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6]李毅.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12):1-11,149.
- [7]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1.
-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8.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84.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3.
-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
-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3]陈序经.东西文化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26.
-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2.
-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9.
-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7]金民卿.毛泽东对“两个结合”的贡献及其在新时代的升华[J].毛泽东思想研究,2023(1):1-11.
- [1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64.

[责任编辑 张向华]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Issue

Initiative , Response , and Orientation: the Three-Dimensional Logic of "Two Combinations" Constructed by the CPC by LI Xuanzhi , ZOU Qingguo P. 5

Adhering to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s one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 Party's centennial struggle. As the main body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 the CPC follows the triple logic of " active choice—response to shocks—pointing to confi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 Two Combinations" . Among them , the logic of active choice reflects the initiative of the CPC 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 the logic of response to the shock involves the objective needs of "Two Combinations" , and the logic of pointing to confirmation reflects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direction of "Two Combinations" . In the process of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 the CPC took the initiative to choose the leap from "One Combination" to "Two Combinations" , responded forcefully to the impact of dogmatism and overall westernization , and confirmed the positioning and direction of "Two Combinations" from different angles. Finally , in the triple approach of choice , response and orientation , "Two Combinations" were completely constructed.

Key words: "Two Combinations"; construct logic;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Life Quality of Rural Families by DING Keke , MA Zhengbing P. 18

Guided by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life quality ,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life quality of rural families in China , and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farmer cooperatives. 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ife quality of rural families , and its three sub dimensions also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 with the degree of digitization be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life quality of rural families is U-shaped , and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n the life quality of rural families with heavy household burdens is stronger.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reveals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improve the life quality of rural families by optimizing the operating methods of farmer cooperativ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cooperative operations , and the effect of optimizing operating methods is more pronounced. It proposes suggestions such as further developi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 encouraging farmer cooperatives to engage in physical processing , e-commerce , leisure agriculture , and rural tourism , and improving the profit distribution system for farmer cooperatives.

Key word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farmers cooperative; life quality of rural families

On the Three Approaches of Ethnographic Translation i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Context by TANG Xuhua P. 36

ONG's four-stage theory of human cultural history based on the bipolar theory of orality and literacy provide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e diversified approaches in ethnographic translation in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y. Since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 foreign missionary and exploration activities penetrated into China's inland. English-speaking western anthropologists carried out in-depth ethnographic translation on various indigenous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 As they went deeper into the interior and even borderlands of China , their ethnographic translational space evolved from the study to the field. Based on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of *Miao Albums* , *Naxi Scriptures* and Chuanmiao tribal oral arts , English-speaking anthropologists conducted three